

文化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读邓小平《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

□ 赵纪萍

核心阅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特别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对八路军的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思考，尤其强调文化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宣传思想工作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对于今天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

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邓小平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强调文化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指出“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

邓小平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形势分析指出当时中国存在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认为“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邓小平指出，“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是为了实现“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政治目的，并主张把“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作为党的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

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邓小平指出，他们“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主义”，“颂扬独裁政治，反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起到了帮助作用，对民族前途却是危害极大，因此必须坚决反对。

对于抗战民主派，邓小平指出他们在文化上主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即“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通过对中国当时各种不同势

力、不同派别的政治、文化的具体分析，邓小平准确地总结了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强调“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文化工作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实践中为文化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邓小平不仅阐明了文化工作的根本方向，还对抗战以来部队文化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客观总结。

一方面，邓小平肯定了抗战以来部队文化工作的成绩。他指出：“抗战以来，由于部队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使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上提高了一步，也为文化艺术工作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另一方面，邓小平客观地指出文化工作中存在问题和不足是难免的，并从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和不足的主要表现：一是文化工作既缺乏高深研究，又没有深入群众，需要进一步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二是宣传内容滞后，未能与当前形势配合起来成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宣传效果有待提高。三是文艺作品既缺乏现实性和艺术性，又缺乏强烈的政治性，需要在文化工作大众化和政治引导力方面下功夫。四是存在文化干部荒的现象，需要加强文化干部队伍建设。五是对外宣传工作存在缺陷，需要加紧弥补对外宣传工作的缺陷。

那么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是什么呢？邓小平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

析。一是“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认识得不够，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做得不充分”。二是对文化工作者的重视和爱护不够，主要表现为“对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注意得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三是文化工作者缺乏群众工作经验，“不够群众化”。

如何做好文化工作

针对当时部队文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邓小平就如何做好文化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一是牢牢把握建设的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邓小平指出，要“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宣传思想战线中的指导地位，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工作，强调要认识到“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要为政治目的服务，确保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毫不动摇地走群众路线，把服务群众同依靠群众结合起来。一方面，文化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服务群众，着眼于广大群众的关切，努力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强调文化工作要在“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这方面下功夫，“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既提高创作水准，又深入大众”，创作出兼具“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性”的作品，用“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实现“文化

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的目的。另一方面，文化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挖掘群众中的丰富资源，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文化工作的不竭动力和活的源泉。因此，邓小平强调党的文化机关和文化工作者要“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具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态度”，“要将自己的作品就教于大众，倾听大众的意见”。

三是重视发挥宣传队的作用，打造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宣传思想工作，“笔杆子”和“枪杆子”被认为是我们党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两大重要武器。邓小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此特别强调做好文化工作必须重视发挥宣传队的作用，并对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如何发挥宣传队的作用提出了建议、作出了部署。一是要造就大批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文化工作者，这是建设高素质宣传队的人才保证。邓小平要求加强文化工作者“在文艺方面的修养和政治学习，给以必需的可能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渗透到现实的底层里去，更充分地发挥其才干”，使他们能够真正担负起文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二是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邓小平指出，必须“加紧弥补对外宣传工作的缺陷”，通过各种形式“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事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政策和战绩。三是要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加强文化宣传的协同能力。邓小平认为做好文化宣传工作必须贯彻团结原则，要求宣传教育部门应“协同统战部门”、“积极会同地方党组织、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及地方文化机关”、“要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小学教员等取得密切联系”，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加强文化宣传的协同能力，让全国和全世界听到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为中国共产党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重读经典

我之前读过不少经济学教材，可最近读王东京教授撰写的《经济学讲义》，让我耳目一新。这本书虽然是叫“讲义”，但却与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不同，书中既没有复杂的数学模型，也没有难懂的专业术语。作者举重若轻，却把经济学讲得清晰透彻，娓娓道来、妙趣横生。

时下也有经济学教材写得很通俗，可案例大多是国外的，让人总感觉有隔膜感。王东京教授长期在中央党校工作，接触的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案例，也深知国内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的心结与困惑。把这些鲜活的案例写进讲义，用中国的事说经济学的理，读来既有现场感，又好读易懂。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经济学讲义》，正是这方面的尝试。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曾用经济学研究婚姻、家庭，并因此荣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贝克尔有句名言：“经济学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们司空见惯、深信不疑，但若从经济学视角考量，却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我们常说“少花钱、多办事”，这句话对不对？读过《经济学讲义》之后就会明白，也对也不对，关键看谁来花钱、为谁办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经济学讲义》中总结得很精辟，也很传神，但若不通破这层窗户纸，我们好像还悟不出这些“道理”来。由此可见，熟知并不等于真知，而这种差异，反映的就是经济学思维和经济学素养。

经济现象非常复杂，可以做多角度分析。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得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遵守经济分析的基本规范。一个人懂不懂经济、水平怎么样，关键就看这一点。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人有朴素的经济学思维，也掌握一些片段化的经济知识，而且遇到问题也能谈一些观点，但往往比较片面，容易各执一端，各说各话，相互间难以达成共识。

供求决定价格，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也是分析市场定价的基本规范。其实这个道理大多数人都懂，可遇到具体问题却往往被丢到脑后。《经济学讲义》中这方面的例证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把菜价高归咎于中间商，说一斤萝卜从宁夏到北京，价格上涨了8倍，北京市民吃得贵，宁夏农民赚得少，大头被中间商拿走了，所以要打击中间商。问题在于，萝卜价格是供求决定的，要平抑价格，就得往北京多调萝卜；如果头痛医脚，不想办法增加供给而是把中间商打跑了，萝卜价格岂不会涨得更高？

另一个例子，是地价推高了房价还是房价拉高了地价？地价是房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高地价就一定推高房价。设想一下，若住房供过于求，地价再高房价也涨不起来；反过来，如果住房供不应求，地价再低，房价也摁不住。诸如此

用中国的事讲经济学的理

——读王东京《经济学讲义》

□ 张宝江

类的问题，迷惑性还挺强。如果经济学素养不够、功底不够扎实，往往就会被迷惑。

经济学是经世济用的科学，其微观机理就在于，可以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倾向，通过政策与制度安排，对公众的行为进行引导。需求定律说，行为选择都是在既定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资源是稀缺的，每个人都争用，所以就制定竞争规则，而规则一旦定出来，就成了约束行为选择的条件。比如以“比武力”为规则，人们就会苦练武功；若以“比考分”为规则，人们就会刻苦读书。再以公房分配为例，若按工龄分，人们就会多熬年头；若按家庭人口分，人们就会多生孩子。

《经济学讲义》中指出，人的行为选择既有消极的、非生产性的，也有积极的、生产性的，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对此，经济学并不做道德评价，只是告诉我们，存在对公众行为进行引导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是，往哪个方向引导、规则的有效性如何？这个问题往大了说关乎国计民生；往小了说，关乎一个单位的风气和生态，所以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都应重视建章立制。

在政策操作层面，《经济学讲义》中也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比如对怎样推动科技创新、怎样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样扩大内需稳定就业、怎样畅通国内循环、怎样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用经济学逻辑条分缕析，让人深受启发。

书海泛舟

于光远（1915—2013年），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光远的治学之道主要集中于他的《碎思录》一书。此书主要收录他写于1987年和1988年的100篇格言式的短文。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蕴含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扎实的治学心得。他善于从自己所处时代研究时代特点和时代任务，并且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让细节纯粹起来的问题意识。从总体上看，于光远的治学涵盖独立思考、深入研究、批判分析、认识自我以及学思结合。

独立思考，不搞大合唱

学术研究不是搞大合唱、滥竽充数，它为追求真理而存在。个人的独立思考和探索是认识真理的必备条件。于光远认为：“‘独立思考’就是不盲从，不附和，……思考的本性就是独立的，不独立就谈不到思考。‘只服从真理’讲的是服从什么的问题。能服从一己的利害得失吗？能服从真理以外的某种权威吗？”思考具有独立性，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是他人的附庸。思考服从于真理，它不是个人利益的奴仆，更不是应声虫。因此，要做到独立思考，一要不计个人的一己之私，二要实事求是。



□ 夏自魁

学问地位，不能取代具体真理

真理有其存在的具体条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旦跨越其赖以成立的条件，则会变成谬误。于光远强调：“真理是具体的，不存在抽象的真理。……一个人，不论他学问多大，地位多高，如果对某个具体事物未作具体分析，他就只是一个门外汉。我不主张取消门外汉的发言权，但他应有自知之明，尊重掌握了具体真理的人，向他们学习。”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个人不能依仗自己的地位和学问，就认为高人一等，并以此认为自己是专家。殊不知，没有掌握具体的真理，没有了解新情况就胡乱发言，瞎指挥，那他就是个门外汉，不懂装懂。在具体的条件和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情况下，具体真理的特殊性不是靠已有的经验和一般的认识能够取代的。它需要人们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不受制于地位和已有的学问，切忌用堂而皇之的理由代替其特殊性。

仔细研究，不膜拜盲从

什么是研究，如何展开研究？于光远对此作出言简意赅的界定。他认为：“‘研究’是词典中我最喜欢的词之一。‘研’成粉末，言考察之精细也。‘究’是溪流之尽处，言考察之深远也。遇到任何问题，本人第一个反应便是要对它进行研究。”究其本源，细微处见真章。凡天下事，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细节决定成败。厘清任何一个问题，需要作出精细的研究，寻根究底。研究所做的工作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格物致知，它必须具有孜孜不倦的精神。

批判分析，不笼统接受

面对新思想和新语言，正确的

态度是作出分析后再选择。不是因为其新鲜或时髦，或所谓的创新就要盲目接受。有的所谓创新，只不过是过往的回忆，贴上新标签，本质并未改变。于光远指出：“一个人在自己的进步中应该接受新思想，从而也应该接受新语言，而且应该经常这样做。但不应有任何盲目性，不应该随便接受，也不应该随便拒绝。应该对未曾接触过的语言持批判的即分析的态度。”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新的思想用新的语言来表达，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不要盲从，笼统接受。对新思想和新语言既不盲目接受，亦不随意拒绝。正确的态度是在分析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取舍。

认识自我，不沾沾自喜

做学问，必须谦虚谨慎，自我反省。切不可眼高于顶，目中无人，盲

目自大。于光远说：“取得某种‘研究成果’后沾沾自喜，会使自己成为本人劳动成果的奴隶。这也是一种‘劳动异化’……这是可能遇到的一个陷阱。避免的办法是把研究的成果置于自己批判对象的地位。”人最难以认识的便是自我，认识自我是一件困难的事。学者发表自己的精神产品，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的能力和学术的地位。但是，如果过度地迷恋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摆出一副天下第一的姿态，视他人为土鸡瓦狗，则难于进步。必须时刻警醒：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干什么。摆脱自我迷惑，需要树立自我批判、精益求精、谦卑的学习态度。唯有如此，方可进步。

思考写作，不眼高手低

思想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每个人有其选择表达的权利。思考和写

作需要同步进行。只思考不写作，难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甚至是懒惰的借口。于光远对表达和思考有着这样的认识：“人各有特点，我的特点就是思考和写作。我感到世界上总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思考了就想留个记录，就去写。多年如此，养成了我的习惯。自己体会到，这种思和写有助于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深入。”于光远提倡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记录自己的思考所得，养成随时随地勤于动手的写作习惯，这有助于加深思考，不会天马行空地想过之后就遗忘了。记录自己的思考，还可以避免光说不练的“假把式”。随想随记是个好的习惯，这让自己的思考更条理，写作会让自己的思路更清晰。

思考与写作已经成为于光远的日常生活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也是笔耕不辍。他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居家如此，在飞机上、火车上也是如此，哪怕是仅有的一点边角时间，他便充分利用，抓紧写作。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他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一位与他几十年未见面的延安时期的老战友，竟然凭着他在候机厅中以膝为桌低头写作的身影认出了他。那位老战友感慨地说：“于光远当年在延安就是这样抓紧时间。几十年如一日，一点没变。我一看到有人候机时还在低头写作，就判断一定是他。”于光远著述颇丰，这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